

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对 1949 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的考察和怀念，以吴冠中为中心

燕 舞

“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更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尚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

1949 年 2 月 25 日，在写给母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油画教授吴大羽的信中，吴冠中这样倾诉着他提前回国的决心。

新生红色政权的热切召唤，影响着每一位持国民党中华民国护照的留法学生的心境。其实，吴冠中 1947 年来法国前并没有他日学成回国的计划，“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吴冠中对国民党的腐败痛恨已久，对中共又缺乏接触和了解，但致命的是，“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

而且，中共派来巴黎参加同年 4 月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两位女代表陆瑾和区棠亮，也邀请部分留法学生在咖啡馆叙谈，向他们介绍解放战争的进展和解放区的留学生政策。

“回与留”的抉择也考验着与吴冠中同一批考取公费出国的熊秉明。1949 年 9 月 25 日，尽管雕塑教授纪蒙（Gimond）对他的作品泥稿许以强烈赞许：“不错，不错！简直比欧洲人还要欧洲风呢，简直有点拉丁味，罗丹的那种拉丁味”，但这并不能缓解熊秉明的犹疑和焦虑——他的两年公费留学期限在暑假即已到期。

在当日的日记里，熊秉明继续写道：“我一时瞠然愕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正处在精神最苦闷、最困恼的时刻，我决定暂不回国去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技

能还不成熟，但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不是欧化、西化，我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并不需要变成欧洲人。”

随后的10月3日，熊秉明在里昂车站送走了顾寿观、王道乾和刘文清等三位一道东返的留法同学，“最近他们在思想上都有转变，好像是为面临那边的新情况作准备”，“寿观说只有耕田、锄地、收割是真的劳动，道乾诅咒艺术的无用与虚谎，文清呢，以为在新社会里画家可以尽情快活地创作。”

“多数留法同学回国后，周围突然寂寞起来。”在巴黎的这个秋天里，回国的同学越来越多，以致熊秉明在10月13日的日记里这样感叹，还不忘安慰自己：“艺术家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跑到巴黎来，其实都是脱离自己的土地，拔出自己的根，变成一种孤立的荒谬的存在，在贫困、惶惑和绝望里磨炼，寻找生命和艺术最后的意义，通过一个极限情况来观察个人化成怎样的元素或结晶。”

转眼之间，新中国诞生四月有余，吴冠中和熊秉明等就“回与留”的论争日趋激烈。

1950年2月25日，熊秉明和吴冠中、王熙民在巴黎大学城就“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彻夜激辩。争到次日早晨七点，熊秉明能够肯定的是：“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各有不同的命运，说离开故土便缺少营养，是不一定的，正像回到故土也不一定就结得出果实。”

熊秉明选择了继续留下，但他也能接受吴冠中和王熙民毅然回国的决定，“他们比我的归心切，我很懂得他们，何况他们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学习该告一段落了。”

32年后重抄1950年2月26日的那则日记时，熊秉明“抚今追昔，感到悚然与肃然”，因为“这三十余年来的生活仿佛是这一夜谈话的继续，好像从那一夜起，我们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是逗留在国外的人，都从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气质、机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艰辛，取得不同的收获。当时不可知的，预感着的，期冀着的，都或已实现，或已幻灭，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晓。”

在顾寿观、王道乾、刘文清、吴冠中和熊秉明等做出不同选择的那个时段，吴冠中杭州艺专的学长赵无极，1949年5月已在克勒兹画廊举办来巴黎一年后的首次个展；次年，赵无极开始参加著名的“五月沙龙”。

而同为杭州艺专校友的朱德群于1948年年底随他服务的“中央大学”，从南京到了台北，直到1955年才离台赴法深造。1997年12月和2002年12月，朱德群和赵无极分别先后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朱德群成为该院两百年来第

一位华裔院士。

如果视野更开阔一点会发现：1948年，程抱一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于这一年的12月来到巴黎深造；一年赞助期满，“无法像许多在国内拿到大学文凭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接进入大学读学位”，只好在巴黎的法语联盟开始注册学习法语。在融入法国主流文化的艰难过程中，程抱一的研究和创作逐渐拓展到小说、诗歌、艺术批评和书法等多个门类。2002年6月13日，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吸收的第一位亚裔院士。

1981年冬天，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组成的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西非三国，次年年初返程途经巴黎，与阔别多年的朱德群、熊秉明和赵无极会面。这是吴冠中30余年后第一次重返巴黎，熊秉明“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么？”

吴冠中摇了摇头：“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与三十年前的巴黎依旧依旧，三十年前的失落感也依旧依旧，这失落感恐怕来自故国农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园。”

这次重逢，吴冠中与朱德群阔别近四十年，他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的老师吴大羽在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辞：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是啊，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1949年前后的留守与归返，导致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杭州艺专的高材生和熊秉明乃至程抱一（虽然他主要是以学者、诗人和作家身份名世，但画册和艺术专论在程抱一的研究和创作领域中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他近30年来先后发表过《想象的空间——千年的中国绘画论》（1980）、《笔法天才朱耷》（1986）、《石涛：世界之真味》（1998）、《充气符号》（2000）等著作。而且，程抱一对赵无极和熊秉明的创作进行过评论且时相过从），在日后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或在中国承受历次政治运动或艰难地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天各一方、勤苦求索，但在艺术和学术的终极考验前，他们这些“怀有同样心愿的人”又一辈子“无别离”。

二

1949年前后留法的那一代艺术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境和出国心态及人生际遇，其中家境较好的当属赵无极、熊秉明和程抱一、朱德群，吴冠中是家境最为贫苦的。

赵无极1921年2月13日生于北平，并在上海北面的小城南通度过童年，“族谱可上溯至宋朝（960—1279年）皇族”，“每年祭奠先祖冥诞之日，赵家

便摆上传家之宝，赵孟頫和米芾的两幅画。年轻的赵无极尤其推崇米芾，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热衷于艺术收藏的银行家，叔父是留法业余画家，赵无极 1935 年以 14 岁的年纪就考上了国立杭州艺专，师从吴大羽先生专习西画。1941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 5 年，1941 年就在重庆举办了个展，还结识了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艾利赛夫（Vadim Elisseeff）。在赵无极还没有去法国时，艾利赛夫 1946 年 6 月就在巴黎池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举办的中国当代绘画展中，推出了赵无极 1945 年创作的 21 幅油画和 7 幅素描。

“挨饿、受冻、怕水、躲土匪、忍受外国人的入侵……谁能不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带来好处呢？”赵无极的父辈们在民国初年这样期待着乱相丛生的中国政局能有所改善，“但善良的父亲希望中国不再有饥荒，不再是英国和日本争相肆虐的殖民地。或许只有法国人态度稍许好些，他们可能还记得两个世纪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风范”，“也许这是二十年后我选择法国的原因。”

“从十六世纪起，中国画就失去了创造力，画家就只会抄袭汉代和宋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中国艺术变成技巧的堆砌，美和技巧被混为一谈，章法用笔都有了模式，再没有想象和意外发明的余地”，“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传统的枷锁中，我要摆脱它。离开中国到法国，便是我对本国文化所做的第一个手术，是解决这个问题开始”，1948 年 2 月 26 日，在弟弟赵无违启程赴美留学后不久，赵无极带着父亲给的三万美金外汇，携妻子谢景兰一同踏上了去法国的旅程。

儿子被父母留下了，赵无极夫妇和全家在黄浦江边的码头合影留念，“全家人都是西式打扮，男士穿大衣、戴礼帽，女士则梳着洛琳·白考儿（Lauren Bacall）式的发型，穿平底鞋、戴皮手套。”

比起赵无极，熊秉明似乎更特殊一些，他是大数学家熊庆来（培养了华罗庚）的次子，“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成绩出众、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1931 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系主任的熊庆来（为该校罗致了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多位一流数学家），再度负笈法国，回母校亨利·普安卡雷学院（Instiut Henri Poincarre）攻读博士学位。

9 岁的熊秉明追随着数学家父亲，在文学家雨果和生物学家巴斯德都曾就读的 Ecole des Feuillantines 上了两年小学。1944 年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熊秉明曾组织“谷风画社”，并于抗战期间举办画展及古书画展。1947 年，当时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 40 个公费留学名额，熊秉明和他大学期间认识的朋友顾寿观恰好同时考取仅有的两个哲学名额。就这样，熊秉明回到了离别 14 年的巴黎。

朱德群 1920 年出生于江苏徐州萧县白土镇一个医生世家，“其父对书法有癖爱，自己也画画和习书法，而且颇有收藏”，6 岁前念私塾的他“在其父指导之下，临摹了不少碑帖。”与其他留法艺术家略有不同的是，朱德群迟至 1955 年才从台湾赴法国，这可能也导致他在大陆的影响力扩散过程更为特殊。

程抱一则是 1929 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四川和上海生活，其中学八年在四川度过，“我的八年中学和八年抗战是契合的。之后我在金陵大学念过一年英国文学。”1948 年，一个幸运的机会（其姑母旅居巴黎）让程抱一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的总部在自 1946 年 11 月 4 日正式成立起就一直设在巴黎，而非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的资助，在英国和法国两个留学目的地中，他因为特别喜欢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的作品而选择了法国，并于同年 12 月途径马赛到达巴黎。

而吴冠中 1919 年 8 月 29 日出生于江苏宜兴闸口乡北渠村，父亲在家族宗祠设立的小学任教，母亲务农、养蚕，这样的穷孩子 1930 年上和桥镇县立鹅山高小，1932 年上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1934 年上浙江大学附设的工业学校，无一不是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1946 年 7 月，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和沈阳等九大城市组织公费留学考试，计划选送 100 多名胜出者赴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等国，其中绘画专业只有两个名额，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另一位考中者就是王熙民。

当时的考题只有两道，一是“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值得铭记的是，工笔花鸟大师陈之佛先生当时是南京教育部的阅卷教师，他惊喜地发现了后来被证实为属于吴冠中的答卷。

陈之佛给了这份卷子 90 多分的高分，囿于当时纪律，老先生只好用毛笔在四张毛边纸上抄录了这份“共答 1715 字”的试卷。2006 年，陈之佛先生的后人从老人遗物中发现了这份试卷，并寄给了吴冠中。

于是，时隔 40 年，人们还能看到 27 岁的吴冠中当年是怎样让他的过人才华流淌在那些毛边纸上：

“……其实艺术品之高下全不以形式手法为绳墨，‘骏马秋风冀北’之美，与‘杏花春雨江南’之美，均各有其特质，如吴李同作大同殿之山水，李思训累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均同臻妙境。要之吾国山水画在唐时已立定基石，后之流派莫不由此脱胎转变而来……”

“……文艺复兴则为此中世文明之否定，以人为世界之主人，一切均力求

现世之享受，故为现实的，以此精神创造种种文化艺术，自皆以‘人’为本位。其后此风披靡全欧，乃奠定西洋美术现实的、人本的之立足点……”

1946年冬，陈之佛先生作为证婚人，见证了即将赴法的吴冠中和朱碧琴在南京的婚礼。这对新人“品尝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传统欢乐”，“她很快怀了孕。我去法国，她住到我农村的老家等待分娩，我们分手攀登人生的新高地。”

三

在回忆1948年2月26日坐上去法国的老客船“安德烈·勒篷”号（Andre Lebon）离开中国的情形时，赵无极说：“我的老师林风眠1913年曾乘此船赴法，1924年回国。”这样一个简单陈述，其实点明了一个长久的传统：赵无极和吴冠中这一代艺术家是沿着林风眠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的足迹（当然这个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去法国留学的。

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追溯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20世纪初年在欧洲的留学，“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及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领导工作。”1925年圣诞节后，林风眠携法国妻子阿丽丝·华丹回国（中途在新加坡同船东返的还有徐悲鸿，历史的误会和个人的性格局限让这两个有着相似旅欧经历的美术大家的恩怨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成为一个公案），1926年受邀担任北京国立美术学院院长；1928年又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专）并担任校长，这所学校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和艺术史的传奇与学术重镇。

林风眠邀集了林文铮、吴大羽、李金发、蔡威廉（蔡元培之女，后与林文铮结婚）等留法艺术精英，当然还有潘天寿这样的国画画家，试图共襄“调和中西艺术”的盛举。赵无极多年以后还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事就是看外国杂志《时代》、《时尚》，我就是在这些杂志上看到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的”，“我的老师林风眠就给我们讲印象派，而且为其辩护。”

“朱德群影响了我的终生。”吴冠中1934年从无锡师范初师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这本来是当时就业前景光明的专业，但在当时全省的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意外结识朱德群，受其影响而毅然决然地考入杭州艺专，跟着这位“小先生”一起加班画国画（当时潘天寿负责国画教学，但这一课程在这所明显欧化的学校里不被足够重视）；即使在学校因躲避战乱而四处流徙时，吴冠中也在朱德群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并将精力转而集中于西

画。

杭州艺专的第一外语就是法语，有一天，赵无极将几乎所有艺专学子对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的向往公开提出来了，他问林风眠校长：“您看我们能不能到巴黎去做画家，以艺术养活自己？”林风眠对巴黎学艺的甘苦比这些年轻人更有发言权，他只是善意地提醒：“你在做梦！那里的画家多如过江之鲫。”

为了圆自己的巴黎梦，吴冠中将毕业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的全部空余时间，都用于去邻近的中央大学“听大学里高、低各班法文”，还请戏剧家焦菊隐先生和附近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辅导自己的法语。

终于，能够坐上美国油轮“海眼”号去法国了，途径意大利的拿波里换乘火车时，吴冠中和一同中榜的王熙民“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到巴黎后换过几次旅店，后来在大学城的比利时馆住下，“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只好分散着寄人篱下。”

“如饥似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进卢浮宫。”进入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吴冠中争分夺秒地将杭州艺专的留法教授或画册中提到的或经典或新潮的画派、作品了解了个遍。时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油画系教授苏弗尔皮（J. M. Souverbie）对吴冠中影响最大，“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而且他后来还鼓励吴冠中回国并“主张上溯到十七世纪以前的传统”。

求学巴黎期间，吴冠中也曾常去私立的“大茅屋”美术学校画素描，这是前辈如常玉、同辈如熊秉明（他与第一任妻子就是在那里相识的）、朱德群等都经常去的地方。闲时，吴冠中也和同学去帮潘玉良提水，“我劝她是否可考虑回国教书，她说徐悲鸿在世她不会回去，她同徐曾在中央大学同事，历来观点对立，矛盾大”，“接着五七年反右，决定了她魂断巴黎的归宿。”

抱着幻想热切地回国后，受历次政治运动牵累，吴冠中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最初，还能把从巴黎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后来越历各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像熊秉明形容的那样，吴冠中“历经了快快活活地画，到拘拘谨谨地画，到战战兢兢地画，到偷着画，到不能画，不配画各个阶段”，“作为艺术家，他被埋葬了三年（三年间，他不能接触画布和画笔）。不知道什么时候（实为1975年——笔者注），戒律略放松了，星期天可以去借了农家的粪筐来充当画架，又开始作画。”

直到1978年3月，吴冠中才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吴冠中作品展”这一“回国后首次个展”。

“我在黄土地上、原始森林中封闭了三十年，重见高楼大厦，现代生活，感到节奏频率的加速。”1981年冬，吴冠中率领詹建俊、刘焕章访问西非三国，才重新第一次走出国门。返程经过巴黎，第一次重回留学之城，因为当年的老同学董宁川是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吴冠中才获准破例住到朱德群的私人寓所——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7年，“我们谈四十年来彼此的路，路崎岖，路曲折，甘苦有异同，而艺术中的探索异曲同工，看了作品，毋须解释，正如我们讲的是母语，不用翻译。”

1989年3月至4月，吴冠中应日本西武百货店社长山崎光雄的邀请，携老伴儿赴巴黎写生一个月。这一次“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不过“在巴黎找出租车与北京一样不方便”。留学时在蒙马特常见的街头卖艺现象仍然存在，于是，同情与感慨交集：“鬻画为生古今中外本质一致，只是当代愈来愈重视经济收益与经营方式，从巴黎和纽约的许多现代画廊出售的作品中去揣摩时式和风尚吧，风尚时时变，苦熬未成名的卖艺人。”

临别前重回母校，当年教室楼下的小院落里的青年学子根本不知道昔日大名鼎鼎的苏弗尔皮教授是何许人也……

1993年，“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在巴黎赛钮奇东方艺术博物馆开幕，吴冠中被巴黎市长授予“巴黎市金勋章”。这一次，小孙孙在卢浮宫中已经能听懂英语的馆藏介绍了。回国的航班上，吴冠中又感慨多多：“八十年代曾两次乘飞机离巴黎返国，均怀着说不尽的感触与企望；这次飞离灯火辉煌的巴黎，却感到飞回明日更辉煌的祖国。”

再以后，“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2002年，吴冠中获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四

“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2004年春节，吴冠中写作了日后被各方反复援引的重要文章《我负丹青！丹青负我！》文中，他承认：“我崇拜的大师及作品有的似乎在黯淡下去，不如杰出的文学作品对我影响之深刻和恒久。”

紧接着，他又论述道：“形象毕竟只显示了一个切面，画面用各种手法暗示

前因后果，都是极有限的。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移，比如阿Q和孔乙己的形象，就不宜用造型艺术来固定他，具象了的阿Q和孔乙己大大缩小了阿Q与孔乙己的代表性和涵盖面”，“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是画家的荣幸，也是民族文化的荣幸，他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

这后半部分关于鲁迅和齐白石的对比，可能就是后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100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这一论断的原始出处。

就是在感念和赞叹妻子1950年代初操持家务、辅佐学成归国后刚刚执教中央美术学院的自己的不易时，吴冠中还是习惯性地以鲁迅的《伤逝》为参照：“购买一张够三人睡的大床、煤球炉、水缸、桌凳……碧琴买菜做饭都带着可雨，我觉得她比子君辛苦。”

吴冠中对鲁迅的推崇以及他在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对鲁迅精神的自觉继承，其他论者多有论述，我关心的是他这代留法艺术家中对鲁迅用情甚深的另一位，即熊秉明——鲁迅在其思想资源中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雕塑家罗丹。而在朱德群、赵无极的相关直接文本中，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对鲁迅的论述（程抱一对鲁迅文学语言的得失则尚有相关论述）。

1936年，14岁的熊秉明正在燕京大学的附中读初三。10月的一天，国文教师李树源走上讲台告诉同学们：“鲁迅先生逝世了”，于是“课堂的空气立即凝结为沉重的静默”。当日和随后几周，李老师讲解了《野草》的《题辞》以及《祥林嫂》、《孔乙己》、《药》、《秋夜》、《风筝》、《我怎样写起小说来》和《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我们似乎在一个季节里陡然成长了一截。”后来，熊秉明还写过一篇《鲁迅〈秋夜〉的分析》，“颇陈述了我对鲁迅作品的欣赏。”

虽然是1946年同一批考中赴法留学名额，熊秉明却是1947年到了巴黎后才结实吴冠中，“第一次见面，他学画，我学哲学，一时抓不到共同的话题，有些冷场的尴尬。忽然说到鲁迅，说到梵高，顿时如烈火碰到干柴，对话于是哗哗剥地燃烧起来”，“后来，我在西方滞留下来，五十多年了，鲁迅的形象一直隐显在我的想象世界里。”

在巴黎立稳脚跟后，熊秉明1962年开始受聘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该校1968年后并入巴黎第三大学），并于1968年后在该院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和“鲁迅作品选读”等课程。

熊秉明旅法期间的艺术创作以雕塑为主，兼及绘画、书法和文学，其中一系

列动物主题的铁焊作品和石膏水牛题材作品广为人知。早在1980年代，熊秉明就用硬纸板剪贴过鲁迅的像。1999年，北大旅欧同学会为庆祝母校此前一年刚刚度过的百年校庆，决定向母校赠送一座雕像。熊秉明的第二任妻子陆丙安“反右”时曾就读于北大，因此“想到我的剪贴鲁迅像可以放大用铁片焊制为浮雕”。这座别致的浮雕后来放置于北大新图书馆。

1999年，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始筹建——它由巴金、冰心倡建——根据熊秉明的弟弟熊秉衡的回忆，熊秉明1930年代中期就读于燕京大学附中时，“三年初中，成绩是全班第一，讲演是全校第一。颁奖者是冰心女士”，“两年后，她和吴文藻先生在昆明见到秉明二哥时，居然一眼认出了他，还再次提起当年演讲比赛的事。”

中央美院的雕刻家孙家钵教授正好替现代文学馆新馆物色赵树理、丁玲、郭沫若、艾青、老舍、曹禺、叶圣陶、巴金、朱自清、茅盾、冰心等11人的全身雕像和沈从文的浮雕铜像以及鲁迅头像的雕塑作者，他向馆长舒乙力荐：“鲁迅雕像最好在巴黎的熊秉明先生做。”熊秉明自然是满口答应，随后和夫人飞抵北京时硬是不辞劳苦地带了一尊鲁迅头像的石膏小样，并且强调“材质一定要用铁板，只有铁才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作为民族脊梁象征的那种硬骨头精神，而且钢铁的颜色也最能传递鲁迅先生身上的那份刚毅、朴实和凝重。”

次年夏天，78岁高龄的熊秉明和夫人亲自来北京焊制和安装铁雕的鲁迅像。熊秉明坚持用铁的材质，是因为鲁迅在《铸剑》、《理水》、《秋夜》等小说中“常以‘铁似的’来比喻他所赞美的人物”；而且，“铁也给人一种现代感……第二次大战之后，由于铜的缺乏和昂贵，出现了大批焊铁雕刻家。废铁的利用更催进了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在雕刻领域的发展”，“鲁迅的风格和许多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有很大不同的一点是，他的风格有现代感。”

在半浮雕和半圆雕的鲁迅雕像阴面，熊秉明特意用准魏碑体抄录了《野草》中的《墓碣文》：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就这样，这尊铁雕2000年以后长立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前西侧的显要处，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文学朝圣者以及熊秉明的友朋。发小杨振宁参观过后，觉得“（鲁迅的头）它给我的总音像是忧郁沉重的气质，敏锐深入的观察力和绝不妥协的精神”，“阳光下的鲁迅头像应该也会特别呈现出鲁迅的深沉的内心世界吧。”

程抱一在熊秉明的追悼会上发言，忆及艺术家的代表作时称：“如果要特举

一象征性的结晶作品，那该是他的鲁迅雕塑像。穿过长年的感应和想象，他最终纯青地托出了大作家那既凛然又亲切的形象。”

而吴冠中在悼念这位最好的朋友远行时，用的文章标题就是“铁的纪念——送别秉明”，这应该是最深入的知人之论。吴冠中甚至认为熊秉明1985年出版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该得诺贝尔奖”，并由其书法艺术阐释道：“在传统的光环与祖先的秘方中，敢于犀利地揭示自己之缺失甚至卑劣的，是鲁迅。秉明，我，我们这一代，起步于鲁迅对传统的尊视而非陶醉的出发点。”

鲁迅不仅影响着熊秉明和吴冠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甚至也影响着他们对革命的认知。鲁迅翻译过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还曾专文介绍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后两位木刻家在熊秉明看来，“都以强烈的黑白对比的版画来表现人生的悲惨和战斗，含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

卢沟桥事变后，熊秉明离家工作，开始“承担起帮助母亲指导弟妹学习的责任”。熊秉明给弟妹们买来开明书店版的苏联作家伊林的《人和山》等作品，他的弟弟熊秉衡“第一次知道了有苏维埃那样的新社会，那样的集体精神。”

当熊秉明在昆明老家分担母亲的家务时，吴冠中已开始随杭州艺专辗转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以躲避战火，“一路奔波，沿途也组织了宣传队，画过抗日宣传画，但思想深处并不以为那些也是艺术。”

杭州艺专在湘西躲避日军空袭时，吴冠中总是让图书馆管理员破例把他反锁在里面临摹“南画大成”，“就当警报声中我锁在图书馆里临古画的时期，罗公柳、彦涵等不少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出外谋生，直至解放后才知他们是去了延安。”

赵无极也记得，“大学生们在共产党的鼓动下第一个站出来；在杭州，美专的木刻家们成了蒋介石的第一批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彦涵后来先后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员和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组副组长等职务，他用16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没去巴黎，直赴延安；半生坎坷，一生求索。”彦涵晚年还表示：“如果我去法国，就没有美好的家庭和可爱的儿子了，我从不后悔！”

五

“早年的留学生，鲜有不回归祖国者，后来因留学而定居异乡者却日渐增多。尽管我们早已告别安土重迁的传统，羁旅异邦者的身心处境仍相当复杂，远非法律上转换国籍那么简单。那些毕业后留在异乡的留学生，有时也被认为不够爱国。”

其实爱与居住，从来没有那样密切的关联——居住者不一定就算示爱，离异者也未必就不深怀眷恋。近年中外关系一旦有事，留学生和留学后定居的‘海外华人’，往往都有一触即发的言行。从这些表现看，他们中多数人的爱国热情，似不比居住在国内的人差；其激动程度，很多时候还超过国内的人。”

在今年7月号的《读书》上，历史学家罗志田在论及20世纪中国留学生史特别是留美学生史时说的这段话，我觉得用来描述1949年前后那一代中国留法艺术家的家国观念和他们1949年以后的人生命运，也是恰当的。

从1970年代初开始，1949年前后那一代留法艺术家，旅居法国的朱德群、赵无极、程抱一和熊秉明开始通过办展、探亲或访学等各种形式，较为集中地回到中国——当然由于“文革”以及对中西不同艺术观（包括苏联文艺观对中国的影响）的认可程度等因素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先回香港、台湾，在时机成熟时才回大陆。

这些旅居法国的艺术家中，赵无极的自传经一位留法艺术史博士翻译后，仍保留着浓浓的西方腔调，以致我觉得他和他的故国保持着最疏远的距离——需要强调的是，这无可厚非，这种相对性冷淡需要足够的理解和同情。

“自1949年起结识的这些（法国）朋友，与我彼此忠诚，他们帮我在这个国家扎根，使我不再想回中国。”赵无极被巴黎乃至法国接纳的过程相对比较顺利，所以他“丝毫没有我先前所担心的那样受到种族歧视”。1952年，结识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父亲是同行，相互认识。”

“文革”中，赵无极和故国亲人的通信从来不谈及这场疯狂的运动，“只知道我的一个侄子是红卫兵”；数年以后才知道他的银行家父亲1968年的死因“正是这样（戴着纸高帽，被众人批斗、咒骂、凌辱，最后被迫认罪），我家的邻居、同街道的孩子和过去受雇于我家的人是最凶的”，“我们在上海的房子被洗劫一空后烧毁，我少年时代的画作和关于毕加索的论文也随之而去……。”

1972年3月，赵无极的第二任太太美琴病逝，他随后终于拿到签证并回国探望阔别24年的母亲——1952年和1956年，他的两位法国朋友倒是在中国先见到了老太太。但回国后受到的官僚化接待、行动的不自由，加之“那时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监狱”——探望狱中的林风眠先生而不得，尤其是父亲冤死的刺激，让赵无极这次来之不易的探亲并不愉快。

最让他不愉快的可能还不止家庭的变故，而是“一个国家的画家、钢琴家、小提琴家都被迫停止创作，下放到凄风苦雨的农村劳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艺术生活可言”，“至于绘画，三十年来都在苏联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阴影之下，成千上万的画作好像都是出自同一画家之手。这段最漫长的岁月被愚蠢和无知所统

治。”

初次探亲返法后，赵无极接受了朋友皮埃尔·施耐德为《快报》做的长篇专访，赵无极“有意不谈‘文化大革命’（自传原文无此引号——笔者注）造成的灾难，只讲毛泽东政权的好处：中国人吃得饱穿得暖了”，“我想这样可以保护我的家人和正在申请来法国的儿子。”果然，赵无极此后每年都能顺利地回国探亲；1975年母亲病危时，第二天就拿到了回国签证，“他们终于让我自由行动。”

但这种策略性的友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动荡年代里家庭变故带来的沮丧和伤害。1974年，赵无极最小的弟弟死于煤气中毒，他怀疑“人们是否向我隐瞒了真正死因”；1979年，留美的弟弟赵无违死于喉癌，赵无极“仿佛嗅到了也会向我袭来的死亡的气息”。

继1981年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举办的“法国博物馆的首次个人展”后，赵无极1983年年初受邀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和台南、台中办展。同年，“中国大陆第一次邀请画家”，赵无极在中国美术馆和杭州母校举办画展，而且请得老友郁风和吴作人为展览图录作序。这一次，这位抽象派大家在故国并未找到太多知音观众，参观者的嘲讽让他“不禁想念巴黎，想念法国朋友了。中国确实已离我很远了。”

1985年夏天，赵无极受杭州母校之邀，携第三任妻子弗朗索瓦兹·马尔凯回国讲学一个月，在那里对全国各地来进修的美术教师进行油画和碳笔素描的培训，“感觉是在为父亲尽孝道”，但又不全是“为了‘光大门户’，只是想让学生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让他们找回每一个作画的人始终都应当保持的自信心，即便是在病痛、朋友亡故、身体衰老等残酷地销蚀斗志时，仍能不断超越过去、追求创新。”

1998年至1999年，上海博物馆以三个特别展览厅举办赵无极在大陆的首次六十年绘画回顾展，次年又分别移师北京和广州。但2007年接受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钱林森访谈时，赵无极直言以告：“可以说，我是在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华时开始与中国真正亲近的”，“希拉克总统精通中国历史，他能随口吟诵中国诗人的名句，又时刻关注中国考古的最新发现。他向我说起中国时的兴奋而仰慕之情，每每让我感动万分。”

相形之下，同样长期旅居法国，但熊秉明可能是这辈留法艺术家中在家国观念上保持着最复杂心态和承受最多煎熬的。在云南大学1936年闹学潮的当口，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父亲熊庆来受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还是回到故乡“为桑梓服务”，尽管“那时云南是一个边远难及的省份，去昆明得办护照，绕道香港、越南，然后经滇越铁路到达”，“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

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

不能不说父亲“为桑梓服务”的精神感染了熊秉明，1944年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大四时被征调入伍，“为美国军官培训中国将士充当英语翻译”。在滇南战场的炮火中夜读里尔克的《罗丹》，熊秉明有次写信给妹妹秉慧，他还用鲁迅式的口吻诉说着他的失望和苦闷：“我一天比一天更觉得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支持不住那些嘲笑，看到祖国的士兵和平民因为受不到好的教育而愚昧，得不到好的供给而褴褛，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而工作的力量发挥不出来。于是，在外国人的眼里，那一举一动都显得可笑”，“而外国人是通过国家的眼镜看我们。我和那些不幸的兄弟们便站在一起，凡是嘲笑他们的，便也嘲笑了我。而且，我是属于要将祖国变强变富的那代，就越支持不住那些任意的嘲讽了。”

但种种现实顾虑还是让熊秉明在1950年选择了继续留在巴黎，“接着五七年反右，一直在回国与否间彷徨的秉明，下决心将其居室改名断念楼”，还是吴冠中懂这位老朋友：“楼名断念，其实正因为念不能断也。”

吴冠中1950年回国后，很长时间没有写信给熊秉明，一度还悲观地写去短筒：“我们此生已不可能再见，连纸上的长谈也无可能，人生短，艺术长，由我们的作品日后相互倾诉吧！”但1979年，熊秉明第一次回国探亲，终于见到了睽违近30年的吴冠中，后者的油画和水墨作品中“远行写生的一类给人以新颖明朗的感觉，表现了对于对象惊喜的倾心，但没有日夕相见的故旧感。”

熊秉明的父亲像赵无极的父亲一样惨死于“文革”中，他对这场疯狂运动的憎恨不可谓不入骨：“母亲提了尿壶扶他同去（开斗争会），夜里还要勉力写交代，无怪他活不过‘文革’。‘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回到伽利略的世纪去”，但他又尝试着在“历史长流”中谅解这段荒谬的历史。

自1960年代开始，熊秉明就在法国身体力行地推广着包括书法、诗歌、散文等在内的中国文化，还为法国拉鲁斯（Larousse）百科全书撰写三个介绍中国哲学（哲学可是他1948年转习雕塑前的老本行）的项目；1985年、1988年、1992年，熊秉明分别回国开办书法方面的“书技班”、“书艺班”和“书道班”。

像吴冠中描写的那样，“长夜梦醒之后，我们常见面了，在香港、台北、巴黎、北京。”1994年，吴冠中和朱德群、熊秉明的联展在新加坡举行；1999年，熊秉明的大型回顾展“远行与回归”在北京、上海、昆明和台北、高雄巡回展出；2002年12月14日逝世前半年多，熊秉明还来北京主讲“书法与人生的终极关怀”，并向南京大学捐赠了他制作的大型雕塑“孺子牛”——这被杨振宁视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认识”。

而朱德群，离台赴法两年后，就于1957年开始回台湾参加第四届台北美展；

长子1962年出生后取名“朱以华”，“希望他以中华为精神之家，不忘中华”；1972年，画室取名为“云雾斋”。

在程抱一逐步融入法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他1975年就应法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前往中国台湾收集民间神话资料；1979年5月，在巴黎结识诗人和散文家徐迟，并在后者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上陆续通过译作实现“文字还乡”；1982年、1997年和1998年，先后三度回国探亲、讲学。

对于程抱一而言，“我尊重所有有价值的文化和国家，这是人生态度问题。因此，最好不用‘骄傲’二字，或者如巴黎爱国华侨所常用的‘扬眉吐气’这样的字眼。我跟法兰西院士们相处，既不昂首挺胸，也从不战战兢兢，而是从善如常，平等处之。”

六

1977年10月19日，在中学同学、同乡叶剑英以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亲自关照下，林风眠终于拿到了赴巴西探望分隔多年的夫人、女儿以及随后定居香港直至终老于此的护照。

临行前，林风眠开始散画，“书画界的许多朋友，不只是在上海的，连外地的朋友都送了一张小画，以示告别。”

吴冠中也收到了老人用挂号信寄来的一幅画，“我哆嗦着打开了画，画的依旧是芦塘和归雁，不过是青蓝色调了。”吴冠中立即回赠了四句诗：“捧读画图湿泪花，青蓝盈幅难安家。浮萍苇叶经霜打，失途归雁去复还”，希望老人能在临行前收到。

移居香港后，林风眠先生开始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有一位一开始并不懂画的“秘书”吴棣榕，吴总是问大师一些“幼稚得近似可笑的”问题。

吴问：“关良画得好吗？”

林答：“关良的作品越小越好，像明信片那么大更好，很有意思。”

吴问：“张大千很厉害吗？”

林又答：“张大千太累了，许多人都跟他吃饭，他要养活许多人。他的画艺术成就很高，还是可以突破的，有潜力。可惜他的应酬太多，我不要像他那样累。”

而问到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林风眠只是告诉吴棣榕：“我能取得这样地位，当时主要是人才少，时代给了我机会。”

在林风眠晚年，杭州艺专的那些优秀毕业生也不时来拜访这位当年的老校长。

据说，赵无极有一次来香港拜访林风眠，他苦恼的是“我怎样再画下去？”林风眠径直告诉他：“太抽象，回到东方。”

而吴冠中有一次去拜望林风眠，老师对他的提醒是：“画家的画变钱变得太快了，也太多了，没有意思。”

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吴冠中晚年也大规模地散画（当然，这也受超越国界的艺术观影响）。

2010年6月25日23点57分，吴冠中撒下相伴六十余年的妻子朱碧琴，一个人去远行。也许，在天堂，他会和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等当年杭州艺专的恩师们再次重逢。

也许，遇到吴大羽先生时，师生二人会会心一笑，会再度忆起大羽师1940年代初给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题辞：

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本文写作得到谢逢蓓的点拨与激励，她还为我介绍了一些相关法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性知识，她敏锐的艺术直觉和深刻的洞察力总是让我深深为之折服，谨致谢忱！）

文中引语和图片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以下书目：

《林风眠传》，“海派大师传记丛书”，郑重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

《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吴冠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

《横站生涯五十年：吴冠中散文精选》，“文汇原创丛书”，吴冠中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

《皓首学术随笔·吴冠中卷》，吴冠中著，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吴带当风》，“吴冠中文集”，吴冠中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月

《画坛春秋：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吴冠中等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11月

《和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集》，钱林森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朱德群传》，“大艺术书房”，祖慰著，文汇出版社，2001年1月

《世界名画家全集·朱德群》，吴钢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

《熊秉明美术随笔》，熊秉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对人性与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陆丙安主编，文汇出版社，2005

年3月

《赵无极自传》，“大艺术书房”，赵无极、弗朗索瓦兹·马尔凯著，邢晓舟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8月

《对话与融合：程抱一创作实践研究》，牛竞凡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